

对商业银行信贷风险产生的理论分析

■李霁友

信贷风险是指借贷人违约不偿还债务,造成金融机构资产损失和利息收入损失的不确定性,或因经济形势变化,贷款本息购买力下降的可能性。它构成了我国商业银行最大的金融风险。据统计,我国金融深化过程中的广义货币(M_2)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比重到1995年已达105%,超过了同期美、日、德等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这表明金融已经深刻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一般来说,商业银行在经营活动中,收益与安全呈负相关,要想取得高收益,必须承担较大的风险。作为融资中介的商业银行,其运行是以高负债为基础的,在经济运行中,这个中介与其它各经济利益主体共同组成一个多边信用的经济网络。一旦某个环节出问题,往往会通过信贷危机表现出来,影响整个网络的运行。90年代以来多次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后果,无不要求我们对金融风险的产生作进一步的考察与研究。本文拟从理论上对商业银行信贷风险产生的必然性进行分析,以期人们对金融风险有一个理性的认识。

一、银行信贷风险产生的一般分析

银行信贷不仅客观存在而且具有一定程度的风险。就银行而言,其经营金融资产的目的在于,把货币的使用权借贷给工商生产经营者,然后取回本金,分享利润。由于货币的流通职能和支付职能使商品内在矛盾外化,可能产生买卖在时空上的分离,即购买商

品与支付货币在时空上的分离。如果某一时刻,债务人无力偿还银行债务,就会由此产生银行信贷风险。在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由于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占主导地位,供求脱节,信贷风险被限定在较小的范围内,局部的可能性不会扩大为全局的必然性,不会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

但在较广泛的商品货币经济条件下,信贷风险的产生就具有必然性和现实性。因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对外交流的进一步扩大,原有资产的升值或贬值往往超乎银行的预料。从微观上讲,商业银行作为融资中介,投资者的任何决策、管理、操作上的失误,都会给银行资产带来损失。从宏观上讲,经济的非均衡发展是常态,均衡发展是非常态。在经济运行中,由于各种不确定因素,国家很难达到社会总需求、积累与消费、经济结构等各项经济社会指标的平衡。商业银行作为金融产业,必然要受到国家货币政策、产业结构调整、对外政策、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所以说,信贷风险是必然的。

此外,虽然银行信贷在推动经济发展、促进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协调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如通过适度的信贷规模、利率、汇率等经济杠杆,在调整产业结构、投资结构、消费结构,保持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同时,引导人们合理消费、理性投资。但由于金融资产的投机性和经济形势的不可确定性,在筹资建项过程中,无论是直接融资(发行银行债

券或其他金融工具),还是间接融资(通过银行信贷),银行都会因自然、市场、价格、人们的心理偏好等因素而存在信贷风险。因为经济网络上每一根链条的变动与断裂,都会通过银行信贷资产的数量和质量表现出来。可以说,在商品货币经济中,只要商业银行作为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通过信贷方式经营金融资产,就必然存在信贷风险。

二、银行信贷风险产生的信息经济学分析

信贷风险产生的必然性,还可以通过信息经济学进行分析。在市场经济中,市场的变化无论从宏观上讲,还是从微观上讲都是很难预测的、是无限的,而人们的认识能力却是有限的(有限理性和不完全信息)。在这种主客观矛盾之中,往往产生经济现象的不可确定性和人们的投机抉择。信息经济学认为,在经济关系中,当几个独立利益主体在同一经济合约中,如果因约前信息的不对称或因约后信息的不对称,一方占有信息优势时,优势方在博弈中将采取“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行为,损害劣势方的利益。根据这一论点,如果要在银行、存款者及借贷者三方的博弈中,维持各方最小的“道德风险”,需要设定有效的契约制度,以平衡各方约前约后的相关信息。以下通过信息经济学的“委托—代理”理论进行具体的分析。

在银行存贷关系中,存在着两对以银行为中介的委托代理关系:一对是存款人与银行的委托代理关系,一对是银行与借款人的委托代理关系。在资金运用、投资风险及收益水平上,前一对关系,银行掌握了更多的信息;后一对关系,企业掌握了更多的信息。那么,根据信息经济学的观点,只要存在这种信息不对称,委托人(信息劣势方)就无法有效地控制自己的资产,维护自己的利益,将因此承担由道德风险而产生的经济损失。从我国现阶段的金融体制来看,由于银行对存款人的硬约束与银行对借款人的软约束并存,经济风险集中表现在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上。

为了减少和分散风险,股份制成了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的有效财产组织形式。其主要特征是通过法定委托关系使财产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应该说,这种资产运行机制有利于明确各方权利与职责,协调相关信息,规范各利益主体的激励功能与约束功能。但由于实际信息掌握的差异,以及由此产生的利益与风险的不对等性,经营者可能因追求一方私利而损害所有者的行为。在外部环境不规范、制度供给不足的

情况下,合约不能有效约束当事人的行为,掌握信息多的一方“经济人”必然为高收益冒风险。我国现行的中央银行最终信贷风险责任机制与存款准备金制度,为“代理人”银行采取“道德风险”行为,提供了制度便利。

可见,委托人(银行)与代理人(企业)的信息不对称性及双方对目标经济行为和制度环境的信息不完全性,是风险产生的重要原因。由于市场复杂多变,即使双方拥有对等的信息,外生变量如利率、汇率、通货膨胀、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等因素也使得双方不可能对某一经济事件(如投资项目)拥有完全信息。这种信息状况直接影响了信贷契约关系的履行,使对等概率的信贷风险往往集中在银行(债权人)身上,而且由于货币宏观调控与商业银行追求经济效益的不完全一致性,使银行处于经营风险的两难境地:扩张性货币政策虽然有利于刺激投资与消费,增强企业还贷能力,但通货膨胀削弱了银行资产的实际购买力;紧缩性货币政策有利于控制经济过热,适时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但这将降低投资与消费水平,导致企业生产的萎缩,从而形成银行大量的不良资产。银行的这种困境使信贷风险成为现代经济危机发生的决堤口。

从社会化大生产的角度看,社会分工加剧了信息的不对称性及信息的专业垄断性。在现代社会,人们对与自身相关的信息的占有量总是多于他人。在现行金融体制下,由于银行获取企业的信息成本太高,缺乏企业的行为信息,这使得企业可以利用这种优势使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采取损害委托人的行为。在银行信贷中表现为,国有企业所有权虚置所形成的“内部人控制”机制,使企业利用“代理人”的信息优势取得收益而不承担风险;又由于监督成本太高,存款人无力监控银行的投资行为,而无法形成对银行的双重约束机制。在政府缺乏获得有效信息的传导机制的情况下,银行与企业作为拥有更多信息的“代理人”,容易把风险转嫁给存款人(初始委托人)。虽然为了社会的稳定及维护宏观经济运行的需要,政府将出面承担“代理人”因“道德风险”所造成的损失,但却为加重企业财税负担和促成新一轮通货膨胀埋下了隐患。这又将从宏观制度上加大银行信贷的风险程度。

从博弈的角度看银行信贷,当银行不能观察到企业项目风险或确认企业风险成本时,银行只能根据企

业平均风险状况,决定贷款利息率,但利率的调整会使那些低风险的企业由于借贷成本较高而退出市场,剩余的愿付高利率的企业均为高风险企业。由此,银行信贷向高风险行业积聚,容易扩大不良资产的数量与品种,造成流动性困难,诱发信贷危机。也就是说,在委托—代理关系中,如果存在双方信息严重不对称,又缺乏低成本的监督机制,银行仅从本身的利益出发,不仅削弱了其融资的中介功能,而且使信贷风险更大了。

从银行业的特殊性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看,由于银行财务信息公开性不高及信息过于专业化,委托人(存款人)对银行资产的流动性和清偿能力很难获得,人们无法对良莠不齐的银行资信加以区别。当一家银行发生信贷危机,出现流动性困难时,人们误以为是整个银行业传来了信贷危机的信号,社会公众大肆挤兑存款,导致整个商业银行体系的崩溃。又由于信贷品种单一,地区间资金流量与流速不平衡,加上国有企业对信贷资金的占用,使银行资产变现困难,这加深了信贷风险的程度。但是如果国家承担最后风险责任,则易损害市场竞争的公平秩序,无法启动银行的激励机制,使政府宏观调控陷入两难困境。可见,在各种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的作用下,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存在,具有客观性。

三、银行信贷风险产生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以科斯、德姆塞茨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崛起,为许多经济现象的分析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信贷风险的产生可借这一理论工具进行分析。

科斯认为,市场与企业构成了现代经济中两种基本的经济组织制度。这两种制度满足如下标准时,可达到社会资源的帕雷托最优,即企业的规模限定在市场交易费用等于企业组织费用的大致范围内,这时候企业如果停止扩张,其效率达到最优状态。按科斯定理的一般表述是:当交易费用为零时,各方之间的谈判将会导致最大的财富安排,并且这与权利的初始分配无关;当交易费用为正时,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会对经济制度的运行效率产生影响。

银行是从信用中介逐步发展起来的。在商品货币经济中,企业生产的并存性与继起性,必使部分企业在某个环节或某个时间段上出现资金闲余,而另一部分企业在某个环节某个时间段上出现资金短缺。直接调节余缺,会产生下述问题,如资金供求在时间、地点及

数量上的不对接,往往使求者不足,供者有余,造成资金的浪费;个别谈判因交易成本太高,影响资金利用效率。这样,为了节省交易双方或多方的谈判、协调成本,作为融资中介的银行业就产生了。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商业银行为了减少投融资双方资金流动的盲目性以及由此而造成的高交易成本而形成的一种市场替代。

那么旨在节省交易费用的商业银行是否可以避免信贷市场上的风险问题呢?根据斯蒂格利茨等人的研究,在诸多不确定市场因素中,即使有银行中介,众多资金盈余者和缺乏者也无法在适当的时间、地点和数量上,找到最佳的投融资组合,因交易费用的降低而减少银行信贷的风险。这是因为:

(一)在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分离的情况下,银行的产权关系是双重的,作为独立的市场利益主体,它必须考虑其交易成本(代理费用),一般来说,只有当代理成本小于委托人直接行使权利的决策成本,同时又小于该产权制下委托人的收益时,代理关系才会维持。银行因要同时满足存款人和贷款人的产权(包括对财产的使用权、占有权、支配权及相关的义务)界定与合理划分,而成为整个经济(信贷)行为是否存在风险和存在多大风险的关键。这里会出现两种情况:第一种,能够维持银行的双重产权关系。这时候,在存款人与银行的关系上,银行的代理成本小于存款人直接投资成本,且小于存款人的利息收益;在银企关系上,企业的代理成本小于银行的直接投资,且小于银行的利率收益。但如果宏观经济环境发生变化,有外生变量的进入,会直接影响银行双重甚至多重产权关系的稳定。企业产销脱节,产品积压的生产危机导致银行不良资产的增加,集中表现为银行的信贷危机。第二种,不能维持银行的双重产权关系。这意味着不能建立以银行为中介的合约关系,但作为“经济人”的企业,具有天然的趋利性,往往以表面上较低的交易费用,通过高风险投资(投机)蒙蔽委托人,来满足双重合约关系的必要条件。如果投机成功,这种产权关系得以继续维持,但委托人的实际交易成本畸高(因为“蒙蔽”行为也需要交易成本的);如果投机失败,经过金融的传导机制,存款人可能挤兑存款,而企业占用的资金又无法收回,最终信贷风险集中表现在银行变现能力上。

(二)在各利益主体产权界定明确的条件下,通过

确定各自的权利义务,建立相应的制约结构,可以节约双边或多边的交易成本(制度的运行成本和监督成本),最大限度地克服搭便车和机会主义倾向,满足各利益主体的利润最大化。但在实际银行信贷过程中,由于市场机制的盲目性与滞后性,政府宏观调控对微观信贷的干预,以及银行初始产权(如自有资金、可控股本等)的差别,产业结构及国际经贸的变化,加大了交易成本的支出,如果企业不能履行合同,又没有分散和担保机制做保证,银行的信贷风险便从可能变成现实。简单地说,银行信贷风险不会因产权明确和相应的制约结构而消除。

由此看来,作为市场替代的银行可通过某种制度的设定,为投融资各方直接谈判减少交易费用,但无法避免自身的经营风险。

四、结束语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银行业无论作为委托代理的融资中介,还是独立的市场利益主体,在经济发展中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它的产生,减少了直接融资双方信息的不对称性并节省了各自的交易费用,但它的出现和发展,又使金融(经济)风险表现得更为集中,并具有突发性、联动性和不确定性的特点。

(二)信贷风险是银行金融风险较为集中的表现,具有必然性。在商品货币经济中,银行是风险与收益,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生产的单一性与需求的多样性,欲望的无限性与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无法解决而相互妥协的产物。经济危机往往通过金融(信贷)风险的积累,周期性地爆发出来,然而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又必须借助银行(信贷)的中介加以推动。信贷风险的两面性(进步性与破坏性),要求我们理性地加强对信贷风险的防范与化解。

(三)既然信贷风险具有必然性,并且与宏观制度、环境有较高的相关度,那么,在经济一体化与金融自由化过程中,一方面必须深化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特别是金融体制的改革,根据具体情况与世界经贸、金融体制接轨;另一方面,必须逐步改变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加强世界金融体制创新,最大限度地消除信贷风险产生的制度障碍。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

(责任编辑:胡淑红)

储蓄背反利率快速增长的成因及政策取向

■高友才

储蓄本应随利率同向变化并藉此调节国民经济运行秩序,然而自1996年以来,我国居民储蓄在国家连续6次降低利率的同时反而快速增长,从而使国家降低利率→减少储蓄→扩大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初衷没能得到很好实现,利率调节机制失灵。这种现象如若不能尽快扭转,势必继续掣肘我国经济发展。因此,弄清储蓄背反利率快速增长的成因并采取有效应对措施,是我们目前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储蓄背反利率快速增长的成因

居民储蓄必然受一国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制约,但导致1996年以来我国居民储蓄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并不是经济和收入水平的快速增长,而是一系列因素促使人们在利率下降时继续储蓄。这种行为看起来不符合利益机理,似乎“理性经济人”假设对我国居民已不再成立。然而透析各种成因我们不难发现,这种背反既是人们的理性选择又是无奈选择。

(一)制度变迁强化了居民储蓄倾向

走过20个年头的我国经济改革越来越多地触及到个人利益,一系列制度变迁改变了居民预期收支心理,强化了居民储蓄倾向。一方面,教育、住房、医疗、养老等各项福利制度改革使过去由国家或集体负担的费用逐步转向由个人负担或由个人、集体、国家共同负担,增加了居民预期支出;另一方面,分配就业制度和企业管理制度的改革,所有制结构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及企业重组,使过去“正式工”稳定递增的收入因失业、下岗、亏损、破产、